

一葉知秋

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2005
20063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八)

一葉知秋

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葉知秋——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996-126-1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hineseupress.com

**An Episo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1968 Hundred-day Wa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Chinese)**
By Tang Shaojie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996-126-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by The Local Printing Press Limited, Hong Kong

序 言

本書所研究和論述的主要問題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除標題外，不加引號)中的群眾問題，即通過對1968年4月下旬至7月底發生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這一事件的記述和評析，著重刻畫出以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形態出現的文革。本書不是致力於對領導和決策文革的上層，而是基於對文革期間的一個基層單位文革個案所作的研究，力求從這一典型的個案當中，再現和反思當年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諸多問題。

文革爆發已經30多年了，結束也已經20多年了。文革出現於20世紀，如今已經進入了21世紀。對於文革的研究，國內學者克服種種困難和不利因素，力爭早日結束那種「『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¹的局面，努力在21世紀之初，初步形成中國人自己對文革的系統批判和全面把握。回顧國人至今對文革的研究和評述，從總體上，注重文革上層政治問題的著作及紀實文學遠遠多於文革下層群眾問題的研究論著，儘管前者對於透視和把握文革的歷史整體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不去盡力挖掘和剖析文革的群眾問題，文革研究總是顯得殘缺不全或蒼白無力。因為，一個極為重要而明顯的事實就是：文革是一場億萬中國人民群眾參加或置身於其中的運動。

1 廖蓋隆：《〈大動亂的年代〉序》(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

文革群眾運動最複雜而又最深刻的方面在於：它既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運動群眾」的運動，又是億萬群眾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動機而進行的運動。文革群眾運動中所呈現的文革領袖與文革群眾的互動、文革上層領導的目標和願望與文革下層群眾的行為和動因的互動、文革領袖權威的集中性與文革群眾力量的廣泛性的互動等等，都使文革成為一場無比曲折、無限多樣的群眾運動。即使是在文革過去多年之後，文革也是中國政治領域和大眾文化生活中一個永久的話題，一個值得永遠探索和研究的課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不研究在世界歷史上極為罕見而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文革群眾運動，如果不以研究文革群眾運動為參照或為前提，任何形式或任何種類的文革研究都難以達到對文革本質的準確切入，也不可能達到對文革整體的透徹把握。

當然，對於任何群眾運動都應加以具體分析和具體對待。評價和研究群眾運動的尺度何在？在於任何一場群眾運動是否有利於或者實現群眾自身的歷史進步、歷史解放。整個文革群眾運動的鼎盛時期不過兩、三年，但這一運動卻給文革的和文革之後的歷史留下了長長的影子。在文革之際和文革之前，我國理論界對於群眾運動大都是給予肯定和人為的拔高。經過文革，人們清醒而又痛切地意識到，像文革這樣的群眾運動決不能讓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這裏，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不應僅僅限於對文革及其群眾運動抱有一種價值上的評判或一種道德上的義憤，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著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為一場極為廣泛的、曾經贏得億萬群眾參加、認可和積極投入的群眾運動，它為甚麼是可能的？它為甚麼又是必然的呢？進而，這又使我們從理論思維的高度上去反思和探尋如下問題：人民群眾創造、推進社會歷史發展是否僅僅指人民群眾正面的

歷史性活動而不包括負面的歷史性活動呢？實際上，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應該包括人民群眾的自身反省、自身批判和自身變革。具體地說，人民群眾在文革歷史中的主體作用是通過逐漸認識並且逐漸克服自身錯誤甚至自我異化的過程而實現的。文革中的群眾問題，大大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理解，有可能使我們第一次去正視人民群眾在創造、推動歷史時自身的失誤和磨難，並且從中反思和汲取無窮的教訓。

研究文革群眾運動最有益的著眼點之一應在於研究文革群眾性事件。

如果說文革群眾運動與 1949 年以後歷次群眾運動的最大區別就是：後者是由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自上而下地有序進行，黨是群眾運動的主幹；而前者在文革初期則是由毛澤東直接號召和發動起來的，自下而上地無序進行，自發性的群眾組織一時成為群眾運動的主幹，那麼，文革群眾組織既不是中國共產黨傳統意義上所領導的群眾組織（如共青團、婦女聯合會、工會和民主黨派），也不可能是游離於文革時期中共黨的領導已轉化為毛澤東個人的制約之外的群眾組織。這樣一種沒有黨所領導但卻受制於毛澤東個人的群眾組織是研究和分析文革群眾運動的關鍵或基線。因為，只有透徹地研究和具體地展示這種群眾組織的性質、結構、功能和取向等等，人們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文革群眾運動（包括群眾性事件）的特點、規模、層次和意義。

文革中有無數個群眾性事件，這裏所說的主要是指那些對文革進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如 1967 年武漢七·二〇事件；或者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如 1968 年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群眾性事件往往標誌著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發展程度、政治運作水平和文革的某些內在機制，透過一些重大的群

眾性事件，既可凝聚地表現出文革發展所經歷的階段和轉換，又可具體地折射出文革過程所蘊含的危機和變數。1968年春夏，清華大學發生的百日大武鬥就是如此，它的意義和影響已遠遠超越出清華大學乃至北京地區。

毫無疑問，百日大武鬥是清華大學文革期間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一事件不僅與幾個其他重大事件一起代表了清華大學文革的歷史及過程，而且由這些事件體現出清華大學對文革的進程乃至對中國當代歷史的發展所具有的直接作用和深刻影響。清華大學作為一所大學，一個社會教育單位或部門，它對文革的直接作用和深刻影響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對於所有其他單位或部門來說是無出其右的。清華大學在文革歷史中所具有的深厚的實踐「個性」和獨特的理論「亮點」，它所具有的典型而又豐富的個案內涵，它所具有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都有待我們及後人去加以開掘和探索。作為文革個案之一的清華事件的綜述和評論，本書也可以算是把百日大武鬥歷史地、追溯性地展現給學術界同仁和後人的一次嘗試。

本書以1968年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基點，分章闡述下列幾個問題：第一章是全景式地記述百日大武鬥的起因和過程；第二章論述文革初期清華有關經歷以及文革給清華帶來的某些災難；第三章主要是以清華文革為例，探討文革的複雜基礎和歷史源流；第四章以清華文革為典型，討論文革中的群眾與領袖、群眾與當權派、群眾與基層幹部的互動；第五章以清華文革兩派的結構和功能來闡述文革群眾組織的界定和取向；第六章專門討論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的觀點和思潮的對立，以及「四一四思潮」的內容和影響；第七章著重討論文革群眾武鬥問題和群眾運動模式問題；第八章以紅衛兵運動在清華大學的興衰來反思和批判紅衛兵運動；最後是概括性的結束語。

儘管在文革研究領域裏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東西，儘管對這一研究本身而言還有許多令人尷尬、困惑和棘手的方面，但是令人十分喜悅的是，在近些年來，文革群眾問題的研究，無論在宏觀的高度把握上還是微觀的深入分析上，無論是在整體的拓寬還是在專題的開創上，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例如，徐友漁先生對造反派問題的研究，印紅標先生和李輝先生對紅衛兵問題的研究，宋永毅先生對文革諸多群眾思潮的研究，王毅先生對文革群眾問題中的傳統文化因素的研究，王友琴女士對文革暴力問題的研究，王紹光先生對武漢地區的文革群眾的研究，李遜女士對上海文革工人造反派興衰史的研究，楊健先生對文革時期的文學藝術特別是民間文學藝術的研究，劉小萌、史衛民先生和定宜莊女士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等等，都對我本人的文革群眾問題個案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示。

本書在敘述中採取倒敘的方式，即由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這一事件引申出文革群眾問題的方方面面。這種敘述方式有可能給某些讀者帶來不便，甚至造成這些讀者對本書結構有著若干意見，但是，我個人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突出與百日大武鬥相關聯的諸多問題，力求使廣大讀者由此及彼，見微知著，進而反思和評判文革群眾問題。同時，本書以1966年6月至1968年8月清華大學的文革歷程為主線，旨在展示清華文革初期的方方面面，力求以小見大，由點到面，再現出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諸多問題，尤其是文革在像清華大學這樣一個高等學府中的某些特點和屬性，為人們考察和瞭解文革為何會在1968年發生轉折提供借鑒或方便。

本書是作為關於單位的文革個案研究的初步嘗試，它主要著眼於文革群眾問題的地區特性、思潮流派、群眾類型、文化專題等方面，這與其說同我在清華大學工作有關，不如說清華

文革本身的典型而又重大直接決定了我的文革研究必須首先「啃」下清華文革這塊「硬核」，再加上我在清華大學的一些文庫裏發現清華文革史料異常豐富並且保存得相當完好，更促使我下決心去開墾清華文革研究這塊園地。本書就是依據清華大學圖書館、檔案館、校史組等機構中所藏清華文革資料、文件、檔案、報刊等等而寫成的。這裏，有必要談談我所遇到、所關心的一些方法和問題。

一、事實的客觀性

在我所接觸到的文革歷史資料和所採訪的當事人中，經常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同一個事實及同一個事件的林林總總的方面，哪些是客觀性的，哪些是非客觀性的，即在當時文革中客觀實在地發生或存在過的方面與後人所回憶、記述、評說的方面之間的「差距」。儘管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是歷史生活與歷史研究在形態上不可避免的差異，但是，「客觀性」的問題涉及面對同一個歷史事實時，由於形勢的變化，時代的變遷，人物的沉浮，評論的深化，當事人和研究者們捨棄掉了哪些方面甚至是「遺忘」了哪些方面，而過分地凸顯或遮蔽另一些方面呢？在文革研究中，就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愈是剛過去不太久遠的事實，其歷史的客觀性和研究的客觀性就愈常常令人生疑或爭論不休。例如，在有的文章或回憶中，人為地貶低或抬高事實的某些方面，隨意地誇大或無視事實的另一些方面，甚至不惜以研究者或回憶者今天的心態、口吻、處境和利益「製造」一些方面，這樣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文革研究和回憶中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某個事實、某個事件隨著其當事人的命運變遷而脫離或者有悖於它們的客觀實在性。這些都大大有損於研究的正確性直至事實的準確性。

儘管人們在歷史研究中注重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是在實際的研究和回憶中，如果把「當代史就是一切歷史」作為出發點，那麼這種研究的價值和回憶的真實則要大打折扣，其事實的客觀性問題就會削弱或消失。我讀過一些回憶文革風雨歲月的書，對其彷彿以 20 世紀 90 年代平常之心「生活」於 60 年代不平常之時，並以前者「剪裁」後者，深感驚愕。

「客觀性」要求歷史的研究和回憶必須從「真」出發，才有可能使歷史的研究比較全面。對於文革來說，事實以及人物本身的客觀歷史地位不是以它們及他們在文革前和文革後的興衰沉浮為根本轉移的。對於這些事實及人物的歷史性臧否首先應以客觀性為前提。

二、評價的多元性

敘述歷史「故事」不易，講明歷史故事的「道理」更難。對於文革這樣相對較近的過去了的歷史來說，不僅在當事人與非當事人之間，而且在當事人與研究者之間、作為回憶者的當事人們之間以及研究者們之間肯定會出現不同的敘說和評價，也肯定會出現對一系列事實和問題的不同看法和意見，尤其是像對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性事件這樣範圍廣、涉及面大和影響深的問題，更是如此。

在我的採訪和收集的材料中，當事人的不同敘說和評價，對同一事實及事件的截然相反的態度和體驗，直接提出了評價的多元性問題。對我個人來說，僅僅顧及到這些不同的評價是相互對立的、完全不相容的，還是把每一個評價看成可供觀察和反思過去歷史的某個視角點或某個切換面。眾多評價恰恰由於它們的不同，才有可能使它們各自分別地作為構成觀察和反

思過去歷史的總圖景當中的某條「經線」或「緯線」，也恰恰由於所有評價的總和，才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處於一種開放的、動態的和隨時有待檢驗和修正的狀態之中。對某個評價來說，僅僅採取一維的或單向的態度，例如，僅僅是從道德上做出善與惡之分，好與壞之辨，還是把這一評價加以多維的或多向的總匯，映現出其政治學、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更不用說歷史學了）總體性的因素。

當然，我在敘述和研究中不會把某種評價當成唯一的、至上的和固定的標準，而是力圖展示那種關於在諸種歷史的可能性中成為必然或現實的可能性的評價。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基於那種關於成為必然或現實的可能性的評價，我也力圖從理論層面上揭示出那種關於潛在的或者作為某些傾向的或轉化了的的多種可能性的評價。評價的多元性往往就是方法的多樣性，評價與其說是不斷加以證明的，不如說是不斷加以證偽的。評價的證明與證偽、評價的可檢驗性與其可修正性都是相輔相成的。

三、問題的敏感性

由於文革研究在目前中國國內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困難，所以文革群眾問題不僅涉及到現今與文革有這樣或那樣瓜葛的人，還涉及到文革研究與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之關係。

在我的採訪中，常遇到某些當事人對自己所經歷的文革某段非凡經歷（即使是受苦受難的經歷）念念不忘，每每加以動情而不能自己，依自己的見解大加讚揚或極力咒罵，情緒化的東西也是他們最為敏感、最為重視的東西，因為他們曾經為之付出了青春、熱淚和鮮血。有人直言：你研究文革群眾問題就不怕冒犯群眾嗎？不怕得罪你周圍那些經歷過文革的群眾嗎？

另一類被採訪者帶著疑慮的眼光說，關於文革兩派，中共中央關於徹底否定文革的總結中不是已說過了嘛，文革兩派都錯了，今天研究文革群眾問題，與今天大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有甚麼直接的聯繫呢？這類研究會給加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甚麼益處呢？

「得罪」或「冒犯」不是可以回避歷史研究敏感性的可以成立的理由，歷史研究的開放性和多樣性已經給這個所謂敏感性的問題做出了回答。個人親身經歷或體驗只能增加有關事實及事件的經驗性，但並不意味著可以保證關於歷史見解的可靠性。

「——苦難向文字轉換為何失重？

——『不可說』的自詡是否『不能思』的自欺？」²

人們與文革有這樣或那樣的瓜葛並不能形成阻礙文革群眾問題研究的理由，這反而會促使我個人去探尋在這些做法背後的原因。

文革的破產是改革的源頭，文革的結束是開放的起點。每當現今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向前邁出巨大步伐時，人們都會不禁以各種方式、從各種角度去反思文革、批判文革，從對文革的否定和反動中去汲取力量，從而義無反顧地加速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在此意義上，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確，文革作為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為 20 世紀人類生活的一個著名事件，其意義和影響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不僅是 20 世紀後半葉的，而且也會延續到 21 世紀上半葉；不僅是現代的，而且也是傳統的，甚至還是所謂「後現代的」。如果把關於文革群眾問題的研究與今天

2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頁301。

的現代化建設加以對立，那也不過是文革的思維模式及其習性在作祟。對此，我個人提出的反問在於：是深入研究包括群眾問題在內的文化諸多問題會有益於推動和擴大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還是回避文化問題、拒絕反思文化問題會加速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呢？

四、意義的深切性

社會歷史是由諸多的群眾運動所構成，至少是由群眾性的歷史活動所構成的。正如著名學者黃仁宇先生在其代表作中所說的：「大歷史的著眼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³這種著眼當然也應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負面」貢獻，或者注重「負面」的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因為，後來的大歷史及後來的群眾運動包含了對上述「負面」的「消化」、理解和變革。

所以，我再次重申，本書以 1968 年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為主線，向廣大讀者提供文革初期在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單位裏的大致經歷，力圖展示出一個文革初期的形態歷史或歷史形態，即一個凝聚了的、體現在清華大學這樣一個領袖與群眾、中央與基層、幹部與群眾、群眾與群眾等諸多矛盾交叉、危機四伏的歷史形態，從而表明文革的必然失敗和徹底破產。還是套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的歷史機緣。」⁴

3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頁271。

4 同上，自序，頁6。

最後，我要以著名學者徐友漁先生在 1996 年文革爆發 30 周年、結束 20 周年之際所作的深刻反思來結束我的這個序言：

30 年前發生的一切，是中國人永遠擺脫不了的惡夢，這夢魘糾纏了我們 10 年，又追隨了我們 20 年。有人恍然返回夢境，就心中滴血；有人則千方百計想遺忘它。傷口可以癒合，境況可以改變，但民族的記憶卻不能消亡。如果我們裝聾作啞，子孫後代會瞧不起我們；如果我們假裝過去甚麼也沒有發生，恥辱也許擺脫了，但尊嚴也不復存在。一個不敢直面過去的民族，有甚麼資格要求未來？30 年的經歷，30 年間的巨變，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考，足夠我們鑒往而知今。⁵

5 徐友漁：〈文化大革命 30 年祭〉，載《焦點》，深圳，1996 年 7 月號，頁 10。

目 錄

| | |
|--|-----|
| 序 言 | vii |
| 第一章 大張撻伐——清華大學 1968 年 「百日大武鬥」紀實 | 1 |
| 一 起因 | 1 |
| 二 過程 | 14 |
| 第二章 風起雲湧——「文革」在清華大學折射出其 第一個高潮 | 33 |
| 一 從清華大學 1966 年 12 月 25 日的「大行動」到 1968 年的「百日大武鬥」說明了甚麼 | 34 |
| 二 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狂瀾萍蹤 | 47 |
| 三 「文革」：清華大學災難的淵藪 | 64 |
| 第三章 眾擎易舉——「文革」為甚麼是群眾性的 | 69 |
| 一 從清華大學的「文革」看「文革」的群眾基礎 | 70 |
| 二 從清華大學的歷史看「文革」的歷史源流 | 78 |
| 三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民「革命」 | 86 |
| 第四章 畸重畸輕——「文革」初期群眾與非群眾 的互動 | 95 |
| 一 領袖與群眾的互動 | 96 |
| 二 「文革」當權派與群眾的互動 | 115 |
| 三 中、基層幹部與群眾的互動。幹部問題是清華大學 「文革」初期的焦點 | 132 |

| | |
|--|-----|
| 第五章 眾志成城——略論「文革」群眾組織的結構和取向 | 151 |
| 一 清華大學「文革」兩派——井岡山兵團和「四一四」及其建制與報刊 | 151 |
| 二 「文革」群眾組織的界定和功能 | 158 |
| 三 「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 | 171 |
| 第六章 見微知著——「文革」群眾思潮的分歧及評析 | 189 |
| 一 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的分歧 | 190 |
| 二 評析 | 219 |
| 三 簡論「四一四思潮」 | 232 |
| 第七章 犖犖大者——略論「文革」的群眾運動 | 245 |
| 一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敲響了「文革」初期群眾運動的喪鐘。1968年是「文革」群眾運動的頂點 | 245 |
| 二 「文革」群眾運動的歸宿——武鬥 | 251 |
| 三 從「群眾運動」到「運動群眾」——簡論「文革」群眾運動的模式 | 260 |
| 四 「文革」群眾運動中知識份子的多舛命運 | 272 |
| 第八章 歧路亡羊——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失敗 | 287 |
| 一 歷史的怪圈：從1966年5月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興起到1968年7月底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後運動紅衛兵主流的衰敗 | 288 |
| 二 歷史的反思：談「紅衛兵情結」 | 296 |
| 三 歷史的輪回：評價紅衛兵問題 | 306 |

| | |
|-------------------------|-----|
| 跋 念茲在茲——「1968年」的幾點啟示 | 315 |
| 一 從「文革」十年看「1968年」 | 316 |
| 二 從中國 20 世紀百年看「1968年」 | 320 |
| 三 從中國 21 世紀初始看「1968年」 | 323 |
| 後記 | 325 |
| 補記 | 329 |
| 參考文獻 | 331 |
| 索引 | 339 |
| 北京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主要區域圖 | 349 |